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6.008

# “羊皮纸叠写”视角下的拜厄特与沈从文

——以《晒干的女巫》为例

李菊花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羊皮纸叠写作为一种历史隐喻,为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延展性的“求异”阐释路径。通过对拜厄特《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进行叠写性解读,可以阐释《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湘西文本之间的叠层关系及两位作家叙述意图的不同:沈从文更注重祛魅,以凸显湘西的民族特性;拜厄特更关注对当代西方社会精神匮乏内在根源的认识,通过拼贴、创造性改写、语图叙事等叠写技巧,肯定一种利奥塔式的“瞬间”崇高美学,以“不可呈现的呈现”复魅生命的崇高。

**关键词:**羊皮纸叠写;沈从文;拜厄特;生命;中国湘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6-0051-07

## 一 问题的提出

A.S.拜厄特是“1945年以来英国50位伟大作家之一”(《泰晤士报》评),其作品主题博广深邃,语言富含隐喻和绮丽的修辞艺术,后现代叙事风格独特。她的很多作品犹如一张互文之网,“通过运用互文手法与英语文学形成诸多文本互涉”<sup>①</sup>。她称自己为“欧洲作家”,探索英语文学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关系<sup>②</sup>,因此在其笔下我们不难发现荷马、奥维德和北欧神话的影子。她对英国和欧洲之外的元素也颇感兴趣,思索“‘神秘的’东方与理性的西方之间的冲突”<sup>③</sup>。拜厄特熟悉

中国文学,曾表示“阅读老舍和沈从文让我了解到中国文学的许多方面”<sup>④</sup>,喜爱阅读莫言、韩东、毕飞宇等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国内部分研究者已关注到拜厄特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如:邱春英的硕士论文讨论了拜厄特与王安忆两位作家笔下的女性身份与女性关系<sup>⑤</sup>;刘须明探讨了《晒干的女巫》(The Dried Witch)中的东方老妇人与美杜莎的相似命运<sup>⑥</sup>;金佳解读了沈从文对拜厄特创作的影响<sup>⑦</sup>。围绕2012年拜厄特中国行,国内媒体主要以新闻报道(凤凰网、中国日报网、经济观察网、《南方都市报》、《文学报》等)和访谈<sup>⑧</sup>为主,

收稿日期:2023-07-1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9A82)

作者简介:李菊花(1978—),女,湖南湘潭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及比较文学研究。

①Buda A. “In the Postmodern Mirror: Intertextuality in *Angels and Insects* by Antonia Susan Byat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2015, 3(2): 66-70.

②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③Pierini F. “Discursive Intertextuality, Parody, and Mise en Abyme in A.S. Byatt’s Short Stories”, *Cultural Intertexts*, 2022, IX(12): 119-133.

④徐蕾,拜厄特,武畅:《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⑤邱春英:《独立的女性自我与和谐的两性关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刘须明:《美杜莎的变形:拜厄特作品中的语图叙事》,《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

⑦2021年在浙江省图书馆主题讲座《拜厄特与沈从文中国文化之旅中的“邂逅”》。

⑧参见止庵,陆建德,A.S.拜厄特:《A.S.拜厄特与中国作家共话文学:与布克奖得主A.S.拜厄特对话》,https://www.zgnfys.com/m/a/nfwx-222.shtml;徐蕾,拜厄特,武畅:《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杨梅菊,楼凌微:《文学作品变得伟大之前需要经过塑造》,http://old.lifeweek.com.cn//2013/0716/41528.shtml;吴永熹:《A.S.拜厄特:我们身处一个对“性”过分着迷的社会》,https://culture.ifeng.com/wenxue/detail\_2014\_02/12/33724875\_1.shtml.

探讨拜厄特的文学创作理念及她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但对其作品缺乏细致深入的文本阐释和比较研究。国外有关拜厄特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并且存在认识模糊或误读,如坎普贝尔(Jane Campbell)认为《晒干的女巫》的故事发生在偏远的朝鲜农村<sup>①</sup>;菲什威克(Sarah Fishwick)将《马蒂斯的故事》(*The Matisse Stories*)与法国文学作品《维拉·罗莎》进行互文性解读时,忽略了其中的短篇故事《中国龙虾》(*The Chinese Lobster*)中的中国文化元素<sup>②</sup>。实际上,拜厄特与中国文学和文化关系匪浅。大家可能只知道拜厄特的2012年中国行,其实早在1988年,拜厄特就来过中国,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对拜厄特的创作起着一定的启悟作用。如:《中国龙虾》置景于一家中国餐馆,中国食物与绘画、生命被紧密勾连在一起;老舍《骆驼祥子》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她的神话书写,“结尾的祥子变得与北欧众神一样,只能接着走下去”<sup>③</sup>。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拜厄特《晒干的女巫》在很大程度上受沈从文的启发,其中的蛊婆形象、男性族祖形象、叔嫂同榻情节与大树自燃结尾均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存在互文指涉。

1845年,英国一位名叫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的散文家,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sup>④</sup>)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叠写羊皮纸》(也译为《重写羊皮本》或《覆写羊皮本》)(*The Palimpsest*)的文章,“引发了叠写羊皮本这个重要概念后来的一系列使用,这既是介绍性的也是首创性的”<sup>⑤</sup>。在德·昆西之前,“叠写羊皮纸”仅指古文本的研究与出版,原指古希腊一种可反复刮去原有痕迹重新书写的羊皮纸(parchment)。为了节约成本,古人将羊皮纸擦洗干净后,在上面重新书写。经过反复

擦洗后羊皮纸上原来的文字本来不再可见,但在德·昆西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化学复原试剂的出现使文字复原成为可能。羊皮纸上每一次的覆写即形成一叠层(layer),与复原再现的已有覆写层层叠加,“新的一层好像掩盖了旧的一层,但实际上每一层都没有消失”<sup>⑥</sup>。德·昆西把人的大脑比作“叠写羊皮纸”,人生经历就像重写羊皮纸上累加的文字一样储存在大脑中,成为记忆,“这一做法开启了19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系列隐喻化的操作”<sup>⑦</sup>,“伴随着后一世纪无意识概念的数次变革”<sup>⑧</sup>。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人们从“叠写”视角考察前文本在新文本的形成和接受过程中的影响,认为不能将“叠写”与“互文性”完全等同看待,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实质上的差别”,“透过‘覆写’的视野,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文本体系内部的相互影响,更多的是一些没有多少线性关系的文本在偶然相遇之后所产生的期待之外的意义”<sup>⑨</sup>。此“求异”视角为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延展性的隐喻路径。论文对拜厄特《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的湘西作品进行叠写性(palimpsestuous)解读,试图阐释《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湘西文本之间的叠层关系和两位作家覆写背后的不同,以此揭示中国文学、文学翻译对拜厄特创作的影响。

## 二 不同时空里的交叠(layering):拜厄特与沈从文

1987年拜厄特发表《糖和其他故事》(*Sugar and Other Stories*),这是她创作的第一部短篇故事集。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拜厄特几次提及《糖和其他故事》中名为《晒干的女巫》的短篇故

①Campbell J. A.S. *Byatt and the Heliotropic Imagination*.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2.

②Fishwick S. “Encounters with Matisse: Space, Art, and Intertextuality in A. S. Byatt’s ‘Matisse Stories’ and Marie Redonnet’s ‘Villa Rosa’”,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4, 99(1): 52-64.

③徐蕾,拜厄特,武畅:《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④这本杂志开始名为《爱丁堡月刊》(*Edinburgh Monthly Magazine*),后来叫做《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Blackwood's Magazine*是其简称,出版时间为1817—1980年。由威廉·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创办,曾以刊载耸人听闻的哥特式恐怖小说而著名。

⑤Dillon S. *The Palimpsest: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1.

⑥De Quincey T. *Suspiria De Profundi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19, p.54.

⑦Dillon S. *The Palimpsest: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1.

⑧Maniquis R. “De Quincey, Varieties of the Palimpsest, and the Unconscious”, *Romanticism*, 2011, 17(3): 309-318.

⑨陆薇:《多重文本间的“互文”与“覆写”——以陈美玲的诗〈乌龟汤〉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事。她说1988年第一次到中国时,当时主办方让她谈谈短篇小说,“彼时并没有写过短篇小说”“觉得很丢脸”的拜厄特请主办方推荐一位中国作家,对方推荐的是沈从文。于是,“我回国后就读了沈从文的作品,熟悉这种体裁。当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有一篇《晒干的女巫》正是受沈从文作品的启发”<sup>①</sup>。也许是距离第一次中国行已过去了20多年,拜厄特已不能准确记得阅读沈从文作品的的时间了。因为《糖和其他故事》最初于1987年4月6日由Chatto & Windus出版,时间上早于拜厄特的第一次中国行。这说明在1988年之前,拜厄特已经阅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并且受其作品启发创作了《晒干的女巫》。从叠写视角来看,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书写与拜厄特《晒干的女巫》形成了一种层叠关系,这些“有关快乐和悲伤的神秘文字不断刻印在大脑的叠写羊皮纸上”<sup>②</sup>,经过文本生产的异化、成层和润色等工作过程,成为羊皮纸上叠写的一层新文本。《晒干的女巫》具有浓郁的中国湘西风,讲述了一位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妇女阿鸥(A-Oa)失去亲人,年老体衰,不得已利用巫术自保兼治病驱邪,出于同情制作“爱的符咒”帮助一对陷入叔嫂恋的情侣,事情曝光后,阿鸥被村民绑在大树上曝晒三天后死去。这个故事与沈从文的一些描写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蛊婆阿鸥取材自沈从文《凤凰》对蛊婆、巫女和落洞女及蛊婆与大树同燃的叙述;拜厄特笔下的昆(Kun)与沈从文《巧秀与冬生》中的族祖形象相似,与《传奇不奇》中受人尊敬的老太太形成对比;查浑(Cha-Hun)和嫂子安娥(An-At)的叔嫂恋与《凤凰》中叔嫂同榻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与阿鸥相依相伴的那只母鸡也可在沈从文《巧秀与冬生》中找到相似的表述。

但《晒干的女巫》下面的叠层(旧文本)并非沈从文的湘西文集,因为我们不能忽略身处不同文化和语言环境下两位作家相遇的可能方式——译本。沈从文作品译本《湘西散记》(*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是位于《晒干的女巫》和沈从文文

集之间的中间叠层。拜厄特很有可能阅读了戴乃迭1982年翻译的《湘西散记》<sup>③</sup>,因为该中英对照本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图书馆(China Centre: KB Chen Library)、St Anne's College Library和St Hilda's College Library均有馆藏,在英国有一定的流通量。1982年,中国文学出版社从沈从文四个不同性质的集子中选取了11篇作品,结集为《湘西散记》,由戴乃迭翻译并出版。这些作品多完成于1932—1937年间,分别出自《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和一个纪实性回忆录。译本属于文本的二次组合,尽管在语言的文本意义层面仍然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但译本与原本之间的意义却可能具有某些非同一性。同时,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非同一性,造成一些文化理解的累积性差异,再加上文字的随境而转,诸多微小的差异累积导致大的不同。戴乃迭在翻译《湘西散记》之前还翻译过《资治通鉴》《红楼梦》等,比较注重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流露出她独特的女性意识和文化融合意识。有研究者曾指出,戴乃迭译本中文化词异化比例高于金缙译本,有时干脆删去文化词不译<sup>④</sup>。从译本的“生成性”维度来看,译本《湘西散记》可以视为一种心理上的“重新写作”。原本与译本之间的关系正如羊皮纸各叠层之间既亲密(intimacy)又分离(separation)的关系——“羊皮纸叠写性……为此种叠写提供了模板,因为它保存了文本的独特性,同时它又允许掺合(contamination)与独立(independence)”<sup>⑤</sup>。沈从文的原本与《湘西散记》译本之间不是“主仆关系”或从属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关系紧密但又相对独立的叠层文本关系。

《晒干的女巫》—《湘西散记》—沈从文湘西文集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结构:时间层面的1987—1982—1930s,空间层面的英国—英国+中国—中国。联结他们之间相遇的羊皮纸既保存着文本,又擦除文本;既有深度层次感,又以平面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述说着中

①徐蕾,拜厄特,武畅:《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②De Quincey T. *Suspiria De Profundi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19, p.55.

③沈从文:《湘西散记》(双语插图本),杨宪益、戴乃迭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湘西散记》1982年出版时,译本上译者为戴乃迭(翻译家杨宪益的夫人),沈从文在序中也强调是戴乃迭翻译。200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双语插图本时,封面上译者为杨宪益、戴乃迭。更改的原因尚不得而知。

④王敏雯:《〈边城〉四种英译本之比较分析》,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⑤Dillon S. *The Palimpsest: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3.

国湘西。

### 三 祛魅与复魅：沈从文与拜厄特笔下的湘西“离题”叠写

德·昆西在阐释叠写羊皮纸模式运作时，曾使用“惊厥”(convulsion)一词，描述人的正常意识暂时关闭，回溯往事的能力得到增强，于是羊皮纸上被遮盖、被覆写的记忆得以再现。后来他在《麦克白的敲门》(*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中又使用“悬置”(suspension)来形容此类现象。“惊厥”也好，“悬置”也罢，均指向偏离现时此地、偏离正常的轨迹，转向记忆深处或曰羊皮纸上被擦洗和覆盖的过去，可用“离题”来归结。德·昆西本人经常以离题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常毫不避讳地在文章中以叙述者介入的口吻说明自己正在离题”<sup>①</sup>，如“叙述离开本题，目的是为了说明我的感情与死亡的形象是如何同夏天的一切情景纠缠在一起”<sup>②</sup>。德·昆西这种“离题”活动通常是在梦境般的、偏离正常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与真实的过去(已被擦除、覆盖的羊皮纸叠层)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具有不一致性、增删性和虚构性。作为一种文学隐喻，离题涉及一些特定写作技法(如拼贴、改写、仿拟、视觉联想等)的使用，复现那些位于下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文字或记忆，又可被视为一种借助从头脑深处攫取、回溯过去进行新的文学创造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离题”的目的通常具有一定的叙述意图，如有研究者认为德·昆西的“离题”是出于伦理赎罪，消除英帝国的殖民负罪感<sup>③</sup>。拜厄特《晒干的女巫》同样采用了“离题”手法，她复现沈从文笔下中国湘西的叙述意图虽与沈从文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沈从文的“作品一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sup>④</sup>，彰显湘西人民的勇敢性与团结性，揭示独特的民族生命美学。拜厄特擅长创造性地改编，通过对沈从文湘西书写的拆解与异域风格重构，对应独特的、更真实的“个人现

实”，在寻找当代社会精神匮乏内在根源的同时复魅女性神秘而伟大的生命文化。

#### (一) 沈从文的湘西“祛魅”书写

沈从文创作时正处于中国苦难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国民党军阀混战，人民生活贫困。那时的湘西封闭、落后，人们穿行于两个世界：一个是普通人的平凡世界，一个是奉行“屠杀政治”的血腥世界；一个世界朴实、友善、单调，一个世界血腥、死亡、惊悚。在《巧秀与冬生》中，冬生母亲杨大娘为人笃实厚道，住在一所小小的房子里，种着一小块菜地，生活虽贫穷却很自在。冬生从小看牛、割草、捡菌子，在与农村其他孩子一样的生活方式中长大。逐渐长大的冬生(《传奇不奇》)进入团防局做事，一次被土匪劫虏，亲眼目睹了一场血腥的火拼。这是当时湘西人“两个世界”的生活常态，也是沈从文亲身经历后的感思：“我还不曾看过什么‘传奇’，比我这一阵子亲身参加的更荒谬更离奇，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生’，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一切都若不得已。”<sup>⑤</sup>沈从文用笔叙说着湘西社会两个世界并存的真实现实，描摹最真切的湘西生命形态，其叙述意图是揭示湘西人顽强的生命特质。拐走巧秀的“五哥”为了巧秀和腹中的生命得以延续，放走了巧秀和冬生，选择自己留下来与立下血盟的兄弟共赴死亡之约。“五哥”让年仅15岁的冬生活了下来，21岁的他却用生命践行了“要死一起死”的兄弟誓言。有诺必践、待友以义、言必信行必果的湘西游侠精神产生于过去，在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缠中形塑着湘西人的性格，铸就其独特的民族性。接受了严酷生活教育、最终绝处逢生活下来的巧秀和冬生，并没有因磨难而灰心丧气、失去生存的信念，展现了湘西人热爱生命、坚守生命的民族生存美学。

又如湘西巫蛊叙述。沈从文为了“辟谬理惑”，其《凤凰》采用一种纪实性叙述手法，概括性地介绍与客观性地分析湘西的“人事”与“生

①段颖杰：《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模型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②De Quincey T. *Suspiria De Profundi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19, p.18.

③段颖杰：《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模型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④沈从文：《湘西散记》(双语插图本)，杨宪益、戴乃迭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1页。

⑤沈从文：《湘西散记》(双语插图本)，杨宪益、戴乃迭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产”<sup>①</sup>。他以一位民俗研究者的口吻解释人们口耳相传的湘西巫事,认为湘西放蛊传说源于孤苦无依的老年妇人与邻里共同体关系的紧张,蛊婆是被当地人妖魔化了的孤寡老妇,被当成莫名其妙的灾祸的替罪羊。同时,三个年龄段形成的蛊婆、女巫和落洞女,其歇斯底里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女性在性方面受到严酷的压抑以及人的无知。沈从文一方面对女性充满悲悯和同情,呼吁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这种纪实性的“离题”书写来破除迷信,“否认这种先知”<sup>②</sup>,呼吁越来越多的民众获得科学知识,摒弃旧的愚昧观念,把湘西建设得更好。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认为沈从文是透过湘西的风景和湘西人来评判现代中国的,“将他的乡民看作一个伦理道德共同体”<sup>③</sup>,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试图擦去那些神秘又荒诞不经的传说,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巫蛊”和“匪区”印象擦除,在羊皮纸上“重写”经客观分析的文字,聚集来自古老民族的气质,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sup>④</sup>。沈从文的作品蕴含一种大悲悯情怀,观照人的现实和终极存在,“以他们自己对人生的独到穿透力来形成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一种根本关怀”<sup>⑤</sup>。

## (二)拜厄特的湘西“复魅”叠写

拜厄特对女性和生命主题情有独钟,曾言作家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之一“是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未留下记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sup>⑥</sup>。她的作品里不乏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女性,她们大多处于压抑、封闭、抑郁状态,“带有一种疏离感、具有自知自觉意识……敏感的女性们思考着时间、身份、家庭和生命的不确定性”<sup>⑦</sup>,如《太阳的影子》中的安娜·塞弗拉尔、《占有》中的维多利亚女诗人兰蒙特和艾什夫人、《婚姻天使》

中的艾米丽·丁尼生等。但拜厄特又在许多场合“尽量避免提及女性主义,因为它被写得太多了”<sup>⑧</sup>,不希望她的作品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女性主义是拜厄特《晒干的女巫》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但不是全部,她更在意生命的存在形式,关注生命与死亡、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关系,并为生命的崇高性背书。

拜厄特采用拼贴叠写,从戴乃迭翻译的《湘西散记》的不同文篇中挑选出叔嫂同榻、母鸡、蛊婆等与生命孕育有关联的叠层文字,将之拼贴、粘合并施以改写,在增添异域风情的同时,创造一个既具原创性又有多样可能性的艺术文本<sup>⑨</sup>。沈从文《巧秀与冬生》中的母鸡和一篮子鸡蛋不仅代表着杨大娘的拳拳母爱,还表达出沈从文对湘西年轻一代生命力的赞歌。拜厄特笔下的阿鸥也养着一只肥肥的母鸡,是失去丈夫和儿女后阿鸥唯一的“亲人”。“肥母鸡神气活现地跑过来迎接她,发出咕咕的欢喜声,抖了抖毛发上的尘土。它偏着头,亮晶晶的眼睛盯着她。”<sup>⑩</sup>母鸡充沛的活力和“肥”(丰盈的生命力)与阿鸥的逐渐干枯形成鲜明的对比,隐喻生命有四季、生育有时令。再如叔嫂同榻情节,沈从文写叔嫂同榻是为了凸显游侠精神,而在拜厄特笔下,查浑与嫂子安娜的叔嫂恋既与游侠精神沾不上边也无半点真爱,唯有伪装、嫁祸。查浑把自己描述为一位巫蛊受害者,与他的妈妈宝梅和嫂子一起转嫁惩罚合谋阿鸥。爱情衰退、生命相轻与母鸡被邻人拧断脖子成为盘中食,阿鸥被缚在大树上晒干自燃而亡,一起合奏出一曲生命枯竭的悲歌。

拜厄特关注独特而真实的个体生命,认为导致生命悲剧的原因在于对个体生命尊严和价值的轻视甚至漠视。生命之重于个体而言,居于首要的是个体不能自轻。失去丈夫与孩子的阿鸥孑然一身,受到以昆为代表的父权共同体以及邻里共

①黄鹤:《神性·巫性·智性——论早期湖湘文学的精神气质》,《中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②沈从文:《湘西散记》(双语插图本),杨宪益、戴乃迭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③Kinkley J.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California: Str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11.

④沈从文:《湘西散记》(双语插图本),杨宪益、戴乃迭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⑤张晓眉:《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第1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⑥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⑦Cushman K. “Antonia Byatt: *Sugar and Other Stories* (Book Review)”,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988, 25(1): 80-81.

⑧徐蕾,拜厄特,武畅:《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⑨Hart C. “Glass Beauty: Coffins and Corpses in A. S. Byatt’s *Possession*”, *Marvels & Tales*, 2012, 26(2): 204-220.

⑩Byatt A S. *Sugar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93.

同体的孤立和排挤后,只能寄身蛊婆作为一种自我保护,这也是她最后的精神慰藉。与其说阿鸥的干枯是生命的自然流逝使然,不如说是存在感的匮乏和精神世界的崩塌所致。同时,拜厄特批评父权社会及所谓的社会规约对生命的压制与伤害,造成生命间的相轻相轧。在《晒干的女巫》中,昆总是用那双严厉无情的眼睛探查和监视小村庄的居民;花样年华的寡嫂被迫成为守节女失去自我和本性;阿鸥的母鸡因为没有交配对象,鸡蛋始终孵化不出小鸡。扭断母鸡(女性)脖颈的与其说是邻人,不如说是钳制、束缚她的父权与所谓的守节信条。

拜厄特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管遭受了来自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压迫,但“身处痛苦、甚至绝望境地的她们展现出坚忍、勇敢,从未放弃希望”<sup>①</sup>。拜厄特采用语图叙事(ekphrasis)这一“离题”手法,复魅生命繁衍的神秘性与崇高性,致敬生命。语图叙事通常试图消弭文字与图像的界限,将图像与文本并置,语言文字和视觉图像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指涉的互文关系,在后现代语境下成为一种颠覆文字权威的解构性力量,可视为德·昆西梦境般“离题”叠写叙事手法的一种。拜厄特对绘画情有独钟,在她的多部作品中艺术家是常客,她的语言被比作“色彩马赛克”,她的文本被称为“纷繁复杂的视觉互文网络”<sup>②</sup>。拜厄特在采访中也曾表示:“我喜欢绘画是因为其中有完全可以战胜语言的视觉成分。”<sup>③</sup>斯图亚特(Jack Stewart)认为在《糖和其他故事》中的一些故事(如《玫瑰色茶杯》《糖》等)里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及颜色的视觉冲击等交缠在一起<sup>④</sup>。《晒干的女巫》的艺术画面感其实完全不输给其他故事。阿鸥在拜厄特笔下犹如一幅立于身前的肖像画,作家从头到脚对之予以细致描述:她干瘦

干瘦的;口腔里很干,犹如太阳底下晒干起了褶子的布;她用那带着砂岩纹的舌头舔着丝滑干燥的碟子;双眼已经失去了水润光泽,眼眶和睫毛干涩不堪,如针刺般疼;腰腹也是干瘪的<sup>⑤</sup>。拜厄特使用了诸如“(画)布(cloth)”“褶皱(creased folds)”“砂岩纹(sand-ripples)”等艺术批评家经常使用的词,从一名画家或艺术批评家的视角,细致点评画布上那具毫无活力的干枯身体。不止如此,拜厄特还勾勒了象征男性权威的昆、阿鸥的师傅老蛊婆、查浑等的肖像画;池塘边阿鸥倒影自怜的场景,“不禁让读者想到美杜莎的头颅”<sup>⑥</sup>;与她相依为命的母鸡最后被扭断脖颈,让人想到美杜莎被砍头的结局,“预示着阿鸥与美杜莎相似的特征和凄惨的命运”<sup>⑦</sup>。

在故事结尾处,作家再一次通过语图叙事渲染了一幅中国文化凤凰涅槃的先锋艺术画:“熊熊燃烧的大火包围了她,热浪滚滚。热浪卷着她离开泥泞的地面,离开噼啪作响正在燃烧的大树,带着她逐渐远去。”<sup>⑧</sup>这是“美杜莎式的痛苦与美、生命与死亡的较量,是受难者不屈不挠的活力”<sup>⑨</sup>,这是一种利奥塔式的崇高,无关乐趣,而是一种苦痛的愉悦,崇高感产生自其不可呈现的呈现,即达到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它是不确定性的,使文本的说教意图变得岌岌可危”<sup>⑩</sup>。阿鸥的生命伴随大树的自燃获得了不确定性、未定性的呈现,在与大火共舞的瞬间,在涅槃的高潮(culmination)瞬间,生命获得了永生。这是一种意识无法触及的、无法捕捉的崇高,充满了突然迸发的能量,具有无限超越性,既给了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和革新性的画面感,又为生命的神秘性增添了一层朦胧外纱。拜厄特在讨论卡尔维诺《变形记》时也曾表达过对“瞬间”崇高感的肯定:“流向各个方向的所有故事或暗含的故事,以确定呈现

①Campbell J. A.S. *Byatt and the Heliotropic Imagination*.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2.

②Stewart J. “Ekphrasis and Lamination in Byatt’s *Babel Tower*”, *Style*, 2009, 43(4): 494-516.

③Worton M. “Of Prisms and Prose: Reading Paintings in A. S. Byatt’s Work”. Alexa Alfer, Michael J. Noble (eds).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 S. Byat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p.18-28.

④Stewart J. “Mixing Colors, Making Designs: A. S. Byatt’s ‘Racine and the Tablecloth’, ‘Rose-Coloured Teacups’, and ‘Sugar’”,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7, 58(3): 237-247.

⑤Byatt A.S. *Sugar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85.

⑥刘须明:《美杜莎的变形:拜厄特作品中的语图叙事》,《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

⑦刘须明:《美杜莎的变形:拜厄特作品中的语图叙事》,《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

⑧Byatt A.S. *Sugar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111.

⑨刘须明:《美杜莎的变形:拜厄特作品中的语图叙事》,《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

⑩Lyotard J.F. “The Sublime and the Avant Garde”, *Paragraph*, 1985, 6(1): 1-18.

的……是一种生动的多样性,包含了所有已知的和未知的神明。即时性,同质多彩。”<sup>①</sup>凑巧的是,“崇高即此刻(The sublime is now)”的理念正是纽曼等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所极力追求和表达的,画家们相信着力表现“瞬间”崇高美学的绘画可以使人看到眼睛所看不到的、永恒的东西。

### 结语

重写羊皮纸作为一种历史隐喻,过去的文本和现在的文本看似同时存在于同一羊皮纸纸面上,似乎消弭了彼此之间的时空距离,然而“叠写羊皮纸并非布满厚厚灰尘的古文字书,而是对过去年代被谋杀(抹杀)文本的一种在场暗恐预言(uncanny harbingers)”<sup>②</sup>,时空及历史与现实的不同影响着作家的叙述意图。沈从文创作湘西系列作品时正逢战乱,生灵涂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湘西因其土匪、山水、巫雠与民族风情散发出特有的魅力,它们“被再现”“被表达”的同时也

被妖魔化、神秘化。沈从文志不在为湘西的神秘再蒙覆上一层面纱,相反他意在祛魅,用平淡而冷峻的笔展现生命形态最真切的一面,揭示浸入湘西骨髓的坚守与顽强,并将之视为中华民族特性的一部分。拜厄特《糖和其他故事》创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正值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孤独、忧虑和怀旧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状况,身份认同危机、物质进步与精神空虚之间的冲突和人们的生活相伴相随。诞生于此语境下的《糖和其他故事》,“‘迷失’成为一个中心话题……故事中的人们被孤立……机会也总与他们无缘”<sup>③</sup>。拜厄特借助短小离散叙事的快捷和轻盈,通过羊皮纸叠写,在一种新的语境中以既新鲜又古老的方式重新讲述。过去故事(沈从文的湘西故事)的生命被延续,同时新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原初的,拥有自己的生命。隐秘在传说中的中国湘西蛊婆有了自己的名字阿鸱,在拜厄特笔下最终凤凰涅槃,获得了新的生命。

## Palimpsestuousness Between A.S. Byatt and Shen Congwen: A Case Study of *The Dried Witch*

LI Ju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Palimpsestuousness, as an important metaphor, encourages researchers of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explore an expansive way to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x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limpsestuousness between A.S. Byatt's *The Dried Witch* and Shen Congwen's works of west Hunan, focusing on their differences. Shen Congwen intends to disenchant the unfavorable narrative of west Hunan and thinks highly of Chinese spirits. Byatt is more interested in western world's psychological crisis. She adopts collage, creative rewriting and ekphrasis to give a reenchantment narrative to affirm the “Now” sublimity of life.

**Key words:** palimpsestuousness; Shen Congwen; A.S.Byatt; life; west Hunan of China

(责任校对 唐尧)

①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8 页。

②Dillon S. *The Palimpsest: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13.

③Campbell J. *A.S. Byatt and the Heliotropic Imagination*.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6.